

减负30条,按下课堂改革启动键

教育时评

杨仑

经过一年多的铺垫,2018年最后一天,教育主管部门联合发改委、公安等九个部门,打出了中小学生学习减负组合拳,30条措施囊括了学校、校外机构管理、家庭教育心态等涉及中小学生学习负担的方方面面。

我国中小学生学习负担沉重是诟病已久的顽疾。从1955年第一道减负令出台至今,中小学生学习负担沉重的现象并没有得到缓解,分析个中原因,不外乎指挥棒导向、剧场效应、课堂效

率等。

恢复高考40多年来,基本沿用了用分数衡量能力、用考试筛选人才的人才选拔方式,学业压力自然体现在延长学习时间、一切以分数尤其是高考分数为导向。近年来,随着高考改革步伐日益加速,人才多元化评价体系逐渐成型,为中小学生学习真正减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在学习竞争中,剧场效应非常明显。何为剧场效应?即人们在剧场中观看表演,一些人为了获得最佳的观赏角度选择站起来,迫使剧场内所有人最终都选择站着观看表演。虽然人人都付出了额外的成本,但获得的效果却如同开场时一样。

减负之所以越减越重,很大程度上源于课外机构向家长们兜售教育焦虑。剧场效应的前提是规则执行者失位。过去的一年中,教育部完成了对课外机构的摸排和整改,执行之凌厉、处理之果决,被媒体称为史上最严。强有力的行政介入,为消弭剧场效应、缓解教育焦虑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

决定减负成功与否最核心的部分,则是课堂效率。减负的初衷,无疑是为童年松绑,但绝不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对人才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减负所应该减下去的,是不应该有的负担,而不是降低和牺牲质量。熬时间、增加课时的“添油”战术不灵了,一

脑儿题山卷海的手段失效了。提高课堂效率,用科学化、现代化的办法提升教师个人素质和课堂水准,才是减负的应有之义。这既是对教师本身的要求,也是对教育主管部门如何创新教育方法、消弭分数指挥棒与学生知识水平落差的要求。

我国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现象并非只出现在偏远农村,在大中型城市甚至一线城市中,优质的教育资源依然被追捧。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让尽可能多的学生享受到高水平、高效率的课堂教学,是一项系统而庞大的工程。30条减负令为这个庞大系统按下了启动键,但需要更多的工作才能真正实现减负的初衷,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校园内外

去遗址现场实践不再难 西北大学有了考古VR教室



西北大学日前全面建成投用一个沉浸式考古虚拟互动教学实验室,师生们使用VR技术再现考古场景,可提供身临其境、互动体验的考古教学体验。此举在国内高校尚属首家。

“在沉浸式考古虚拟互动教学实验室中,我们可以把实际采集到的古遗址、古墓葬的数据做成模型,让学生身临其境地进行体验。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帮助学生直观地理解这些不同类型遗迹、遗物的特征,并使书本上的文字、图片描述变得鲜活起来,让学生对其有更细致、更直观、更立体的感受。”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马健介绍说。

据了解,通过虚拟现实考古教学系统,教师可以不受时空限制在虚拟空间中讲解考古或历史知识,还可以利用田野考古发掘实践场景进行虚拟操作,体验现场考古。此外,虚拟现实在考古教育方面应用的一大优点还在于其绝对的安全性,不会因为操作失误造成文物损坏甚至人身安全事故。

考古学科是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科,实践教学起着关键作用。然而学生参与实践训练,前往考古工地、博物馆或者遗址现场的机会是比较有限的,传统辅助图片和文字的二维课堂授课方式,也难以使学生获得身临其境的直观感受。

“这是在考古学教学手段、方法和理念上的一次重大革新。”马健表示。

据介绍,这套沉浸式考古虚拟互动体验教学系统得到唐仲英基金会支持,素材直接来源于一线考古工作获取的真实实物模型,软件开发采用国际流行的游戏引擎,仿真模拟农田、山地、沙漠、绿洲、草原等多种环境下,地上房屋建筑、地下墓葬、窖穴、水井、灰坑等多种遗迹的调查、发掘、记录的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分析、思考能力。

(通讯员李琛 记者史俊斌)

“博新计划”再出发 博士后培养走向“不惑”



实习记者 代小佩

日前,中国科学家首次揭示蜘蛛哺乳行为的新闻,让全球学术界炸开了锅。给学界带来这次惊喜的年轻科学家名叫陈占起。他是在博士后期间与合作导师权锐昌研究员完成该研究的。2016年博士毕业后,他即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生物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年的博士后工作经历,让陈占起颇有感慨,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减轻了生活压力,奠定了独立开展科研的基础,为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支撑。博士后是重要的后备科研力量。为此,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推出一系列相关资助措施,如“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以下简称“博新计划”)“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等。

近日,2019年度“博新计划”启动实施工作,拟遴选400名应届或新近毕业的的优秀博士,进入国内博士后设站单位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我国博士后培养情况如何,还有什么需要改进之处,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国内人才培养的软硬件不比国外差

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曾两次写信给邓小平,建议在中国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制度。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时说:“这个方法很好,我赞成。”一年后,我国正式开始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

如今,30多年过去,我国已培养了11万多名博士后,他们大都成为各个科研领域的骨干。我国博士后培养制度也从“而立”走向“不惑”。

不过,相比欧美国家及亚洲其他地区,我国博士后制度确立较晚。德国的洪堡基金会成立于1860年,其主要任务是资助德国学者到国外去学术旅游,并邀请外国青年才俊来德国从事科研工作。日本学术振兴会也采取类似做法。我国的香港科技大学通过资金支持吸引大量海内外优秀青年学者,成立于1992年,但它已是亚洲名列前茅的高校。

由于成长条件差异,我国一度面临“土博士”不如“洋博士”的尴尬局面。然而,随着国

内科技发展和科研条件改善,这一现象不再是困扰“土博士”的难题。

29岁的林青(化名)于2018年初进入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武汉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他告诉记者:“国外有做得好的博士后,国内也有,主要靠自己。”他说,真正决定科研地位的,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否得到行业认可。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研究员孔大力对此表示赞同。他曾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地球物理与天体物理流体力学研究中心完成博士学位,随后在利弗休姆奖学金(Leverhulme Fellowship)资助下继续依托埃克塞特大学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

“现在国内各种软硬件不比国外差。几十年前,在国内的机会、眼界可能比国外差,但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除了一些前沿领域,各方面基本持平。关键看学生自己的能力和态度。”孔大力强调。

期待博士后资助年限更加灵活

“博新计划”自2016年开始实施。据中国博士后网公布的最新官方统计数据,截止到2017年底,我国博士后在站人数为62314人。相比这一数据,“博新计划”拟遴选出的400名博士可谓凤毛麟角,占比仅为0.64%。

“博新计划”给予入选者每人两年60万元的资助,其中40万元为博士后日常经费,20万元为博士后科学基金。

林青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他所在的博士后站点,博士后分为全额博士后、重点博士后以及其他博士后。类型不同,薪水有别。重点博士后税前薪水较高,每年为24—25万。而“博新计划”入选者获得的资助更多一些。林青表示:“博士后可以算是一份临时工作,有固定薪

水,生活上并没有很大压力。”

相比“博新计划”资助金额的多少,林青更在乎的是博士后在站时间是否能有所延长。“我觉得2年时间有些短,对科研来讲,短期内做出很多东西比较难。”进站之前,林青遇到来中国交流的日本学者,对方惊讶地说:两年博士后研究太短了,在日本通常是3—5年。

相对应的,国外高校一般对博士后没有统一安排,经费来源、时间长短均比较灵活。自实施以来,“博新计划”通常会注明,入选者确因科研项目需要延期出站的,设站单位应参照“博新计划”资助标准,解决好延期期间的经费问题。

保证研究产出并非易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导师贾国柱教授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是国家、地方政府还是机构,对于博士后投入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尽管投入不少,但未必会产生预期效果。”与博士生相比,有些博士后的科研成果数量和质量可能并不具有明显优势,甚至会有所差距。

贾国柱教授认为,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与从事博士后研究的目的有关。“博新计划”明确指出,地方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设站单位应加强配套投入,对“博新计划”入选者在科研经费、住房、津贴补助等方面给予经费支持。“有些博士从事博士后研究,可能并不是出于对科研的热情,而是为了解决户

口、子女上学等问题。如果抱着这样的目的从事博士后研究,做不出好的科研成果也就在所难免了。”

林青对于有些博士比博士后做出的科研成果更好并不意外。“不排除有些博士基础好,毕竟后者也是以前者的研究经历为基础的。”林青说,自己之所以做博士后是希望能全身心投入研究中,把研究深入下去,同时接触新地方,多开展学术交流。

在他看来,讨论研究进展、研究方向和研究事实比发表论文更加重要。他希望跟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做感兴趣的事。“一起共事带来的心情愉悦,是科研乐趣很重要的一部分。”林青说。

备战新高考,天津课改重个性化培养

第二看台

本报记者 孙玉松

作为第二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经过一年多的推进实施,天津高考改革和与之配套的高中课程进展如何?下一步还将有哪些改革举措?这场围绕“高考指挥棒”的改革,无疑牵动着莘莘学子和“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的神经。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教育综合改革的关键环节,改革的主要目标是要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高考改革是系统性工程,需要在‘教、考、招’三方面联动,需要高校和中学协同,学校、家长和考生等不同群体也根据各自定位发挥相应的功能。”2018年12月28日,天津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天津市教育委员会主任荆洪阳介绍说:“新的高考改革和招考批次合并今后将为各高校提供平等竞争的

平台,让考生与院校有更多的双向选择的机会。”

2019年,天津将在优化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时间、健全高校专业选考要求引导机制、制定2020年填报志愿及投档录取方案等方面下功夫,为2020年新高考奠定良好基础。

三类课程分类学习

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为高中教育教学带来了新挑战。荆洪阳表示,“进入新高考的两年来,我们也在积极推进与高考改革相适应的高中课程改革。”他认为,始于2017年天津高中课程改革的“新课改”最大特点就是开始注重个性化培养。

记者了解到,按照天津市教委制定的《2017年天津市普通高中课程安排指导意见》要求,普通高中课程仍由必修、选修Ⅰ、选修Ⅱ三类课程构成。其中,必修课是全体学生必须修习的课

程,是普通高中生发展的共同基础,由国家根据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统一设置。选修Ⅰ课程是学生根据个人需求与升学考试要求选择修习的课程,由国家根据学生专业倾向和个性发展的需求设置。选修Ⅱ课程是学生自主选择修习的课程,包括国家在必修与选修Ⅰ基础上设置的拓展、提高、整合性课程和校本课程。

为了更好地推进课程、教学与新高考改革之间的衔接,天津市教委去年完成了两轮次的全市基础教育行政管理、教研部门领导、所有普通高中学校管理者、全市高中骨干教师及全市高中教研员市级培训,并指导各区完成了区级高中教师全员培训,为高中课改做好了师资准备。

“走班制”成为特色

记者了解到,为了迎接新的高考改革,天津市早在2017年就确立了以第25中学、第二

南开中学、滨海新区紫云中学、天津中学等首批四所高中课改实验学校,在课程建设、教学改革、选课走班、导师制、学生发展指导、综合素质评价以及智慧校园建设等方面的改革。以天津市第二南开中学为例,该校校长孙晋介绍说:“新课改后,高一上半学期以行政班为主,所有学生都要学习语数外理化生史地政9门课,让学生对所有课程都有所了解,此外还要开设生涯指导课程和学业指导课程,其中9门课的学业指导是走班制,学生可以根据兴趣选择课程,老师会对该课程的未来职业方向、所学内容做全方位讲解。”到高一下半学期可能就要开始正式的走班选课了,“语数外三门开始统一的行政班上课,其他6门课程学生就要选择其中3门作为高考主考科目”。

记者了解到,为充分发挥实验学校示范引领作用,天津下一步将在全市推广课改实验中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建设“双一流” 西南大学成立11个学部



“西南大学将依托11个学部,聚焦核心目标,加强重点建设,不断完善‘双一流’管理体制机制,加大编制外人员聘用力度,推进医学研究院和人工智能学院建设,提升服务重庆重大战略需求能力。到2023年,学校要力争使生物学学科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农业科学、化学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群达到国际或国内一流水平,ESI学科排名前1%学科达到2个,ESI学科排名前1%的学科达到13个,教育部A类学科达到8个。”日前,西南大学学部暨“双一流”建设工作推进会成立,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如是说。

据悉,西南大学分别与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签订合作协议,在医学学科建设、平台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共建西南大学附属医院、西南大学附属心理医院、西南大学附属公共卫生医院,共建西南大学医学研究院。同时,与以上3家地方医院在人才联合培养、科学研究等领域开展更加广泛的合作。

西南大学同时宣布将实行学部制,成立生命科学学部、社会科学学部、教育科学学部、艺术学部、农学部等11个学部,推进学术管理简政放权,激发基层学术组织活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推动学科交叉和整合,促进“双一流”公共平台建设,优化专业资源,实施本科大类招生培养。

(记者雍黎)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由受访者供图)

扫一扫
欢迎关注
教育观察
微信公众号

